

陈东有

陈东有

《金瓶梅》论稿

CHENDONGYOU Jinpingmei Lungao

陈东有

《金瓶梅》论稿

陈东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RENMIN CHUBANSHE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2次印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东有《金瓶梅》论稿 / 陈东有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210 - 06638 - 5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金瓶梅》-小说研究-文集
IV. ①I207.4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6180 号

陈东有《金瓶梅》论稿

作者:陈东有

责任编辑:游道勤

封面设计:揭同元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890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5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6638 - 5

赣版权登字 - 01 - 2014 - 49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2.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东有，男，1952年11月出生于江西

省南昌市，祖籍江西丰城。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初下放江西永修恒丰农场劳动。1984年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90年1月获江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6月获厦门大学史学博士学位。三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海洋社会经济史和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1995年、1997年先后破格评聘为副教授、教授。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走向海洋贸易带》《〈元曲选〉音释研究》《〈金瓶梅〉文化研究》《〈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正说〈三国演义〉》《济公系列小说评介》《人欲的解放》，编著《〈金瓶梅〉人物榜》（三册），合著《科教兴国论》等，主编《中国的农民》《现实与虚构》等。

2002年11月任中共南昌大学党委副书记；2003年5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2007年9月任常务副部长；2013年5月起任江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自序

做学问，就是老实地学学问，学从问中来，问后有学，才有得。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84年大学毕业的学士学位论文《汤显祖〈庙记〉中的演剧艺术理论初探》，发表在1984年第3期的《江西大学学报》上。我的指导老师杨忠先生专门从事明清文学史的研究，是研究汤显祖的大家，我常去他家看书、请教。那时的师生关系与今天很不同，学生不仅能在课间与老师聊学问，还能到老师的家里去，翻看老师的藏书，甚至可以把书借走。因为老师和学生都住在校园里，下了课、星期天，都可以去老师家走走，在校园里散步，也可以经常见到老师。当然，最重要的，那个时候，读大学就是为了求知、求学问，所以老师得到学生的尊重，学生受到老师的教诲。真可谓处处是课堂，时时得学问。我的体会，学问不仅仅是来自课堂，也来自于老师家中的请教，来自于课间的闲聊，来自于校园的相遇，当然，还有就某一个专题中的问题师生共同探讨。杨老师对我的这篇论文用心指导，对我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解疑释惑，使我能提前完成了论文的写作；而且他表扬我，说我的论文研究了此前人们不太注意的汤显祖的演剧理论问题，分析了汤显祖更为复杂的思想，他建议我到学报公开发表，他会向学报推荐。每想起此事，心中总有一种激动，感恩不尽，回味无穷。我的这篇论文，今天看来还十分幼稚，但是在当时，由于很快就被学报发表，对我鼓励非常大，我自信可以从事研究工作，从此，也就走上了研究明清文学史的学问之路。大学毕业时，我们这届分配很好，但我坚定不移地要求留校，留校虽然地位不高，工资不高，但有时间读书，有时间做学问。

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去研究《金瓶梅》，直到今天，还有朋友对我（而不是别人）研究提出困惑，甚者不解。我留校任教明清文学史，教学中学生的提问：你

没有读过《金瓶梅》还可以来给我们讲《金瓶梅》？逼迫我不得不认真地阅读并进一步研究这部争论最大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1987年，我开始研究《金瓶梅》中的官职现象，但在做了数千张卡片之后，发现自己学力不足，只得停下。我一方面又回到文学的领域，研究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发表几篇文章后，发现道德评判的漩涡太深，却又难以深入；一方面开始认真阅读明清史。在百般纠结中，我开始读出了《金瓶梅》的经济味。我没有系统学过经济学、经济史，却在研究此书的文化背景时，看到了当时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城镇及其市民文化对成书的决定性意义，于是我提出了“运河经济文化孕育了《金瓶梅》”这一命题，得到了包括江苏、北京、山东、浙江等一大批学者老师在内的同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我带着包括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在内的《金瓶梅》命题开始参与到这部小说的学术讨论之中。这一研究，不仅促进我在明清小说研究中有了自己的成果，而且也转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于是，我从“中国文学史”范畴的小说开始，涉足到“社会经济史”。

从“经济文化”的角度研究小说，会有创新的机会。但什么是“经济文化”，不一定能说清楚，这是我给自己的研究起的一个学问名词。1994年，当我被厦门大学历史所录取为史学博士生，向杨国桢导师求学问疑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学问基础应该是经济史，更全面一点，是社会经济史，即以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理去探讨某一阶段历史问题及其规律，并以此来观察研究其他方面的问题。厦门大学的三年，对我的史学学术培养至关重要。我对历史一直感兴趣，原先读了不少的书，但作为一门学问，必须严格规范。期间，在导师杨国桢先生的指导下，我带着问题读书、看史料，参加学术会，参加学习讨论，外出田野调查。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学问，常学常疑，常疑常问，常问常新，常新又常学，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问导师，问同学，问同行，也问自己。当时，我是28岁读大学，35岁读硕士，42岁读博士。读博士时，问多了，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得问。弄得后来的师弟师妹不知我是教师还是学生。当我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海洋社会经济史后，更感到自己加强学问、抓紧学问的紧迫感。对于这个生长在内陆地区的人来说，要研究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有很多学问的内容都是新的知识、新的命题。如果说从文学进入史学是一个跨越，那么从

一般的社会经济史进入到海洋社会经济史更是一次大的跨越,非得认真老实地学学问不可。

学问是学出来,更是问出来的。学是老老实实地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要去想捷径、找捷径,捷径上的东西都是快餐食品,不仅没有什么营养,只能充一时之饥,而且还有害于身体,把自己的学风搞坏了,得不偿失。记得在1987年考上“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跟随罗元诰导师学“音韵学”,需要每天啃读音韵学著作中的大量注音字例,去找感觉。而在研究《元曲选》“音释”注音字规律时,要做出上万张注音卡片。当时年近七旬的罗老师指导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一张卡片一张卡片地做,这个学问是“熬”出来的。问要不耻下问,有不懂,有疑惑才去问,被问者在你自己看来都应该是比你行的,那你还有什么条件,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还有什么面子、身价放不下来?不论人家如何回答、回答如何,对你都是有益处的。即使人家说他也不懂,那你就知道除你之外还有人不学,说明这个问题更有必要去问,去研究;有了问,才会学无止境,才会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想学,学出了人生的意义,学出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写到这里,又让我想到一个更重要的命题,一个更深切的体悟:通过学问做出来的学问,其实还不是全部的目的,学问的最终目标是在于自己个人的人文精神修养上,是在于自己的人格品位的铸炼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读书、悟书、写书、论书,不都是为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体现和人格的完善吗?而这种完善,就是至善,厦门大学有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说的就是读书学问的过程和目标。什么是“至善”,内容当然十分丰富,有自己个人道德品格学问能力的修养,有对百姓民生的担当,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至于什么时候能达到“至善”?不知道。“至善”如同蓝天苍穹,望则有边,实则无垠,它值得我们不断努力,永远提升自己,这是每一个读书做学问的人一生的目标和追求。

记得读完博士回到南昌大学,有同志要我写一副对联挂在教学大楼门口的立柱上,推却再三,恭敬不如从命,借前辈的佳句,吐自己的心志,把内心的感想表述了出来,与同学们共勉:

问学乃为养正气，
读书不敢忘国忧。

如果要加一横批，那就是“止于至善”。这副对联至今挂了16年。

大学毕业快三十年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也快三十年了，学问之路其实是很艰难的，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何况我的学问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至于人文精神和人格品位的修养，还只是刚刚开始。我把自己三十年的学和问，选了若干，编成是书，分成两本，一本是关于《金瓶梅》方面的研究，一本是关于其他文学与史学方面的研究，请教诸位先生。

衷心感谢三十多年来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同仁，还有我的学生。

陈东有
2013年冬于南昌西无斋

目 录

自序	1
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	1
再论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	9
《金瓶梅》文化意义刍论	20
西门庆的生财与消费之道	30
潘金莲与新旧文化的撞击	50
瓶儿这个女人	67
好一个没规矩的傲婢春梅	84
帮闲食客与商业小社会	96
西门庆为什么没做地主 ——《金瓶梅》中的社会经济问题	113
《金瓶梅》的平民文化内涵	122
话说西门大官人	135
《金瓶梅词话》的非小说意味	141
《金瓶梅》性行为描写中的文化意义	154

《金瓶梅词话》结构特征及其文化信息	178
《金瓶梅词话》诗词文化二三论	205
《金瓶梅》的美学意义	216
论《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思维指向	233
《金瓶梅》的二律背反及其艺术思维	242
新审美价值对旧审美理想的突破 ——再论《金瓶梅》的美学意义	253
《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	264
《金瓶梅词话》对理学和宗教的选择	276
《金瓶梅词话》相面断语考辨	293
相面与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艺术的关系 ——从《金瓶梅词话》相面情节说起	303
社会经济变迁与通俗文学的发展 ——明嘉靖后文学的变异与发展	313
附:陈东有“金瓶梅研究”专著、编著、论文目录	332
跋	335

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

《金瓶梅》这部世情写实长篇章回体小说,以一个新旧观念冲突激烈的家庭为结构中心,以一位商人兼官员的人物活动为主要线索,客观而又真实地再现了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专制政治以及市民生活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现实,其涉及的文化背景也因此而具广泛性的特征。这种广泛性无疑为《金瓶梅》文化研究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据。

但是,又必须看到,由于目前学术界对《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的意见分歧依然很大,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文化背景的时间、空间的界限未得到确定,文化研究的困难不少。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笔者汇集学术界同仁有关意见,将文化研究的时间中心阶段规定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即公元1522年至1620年。空间中心阶段则规定在作品自身已明确标志出来的南北运河枢纽之地——山东临清州(今山东省临清市)的周围。

如果把上述的时间规定与空间规定分开来看,意义并不十分重大:明代自中叶始,经济思想诸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异端邪说”迭起民间,政治统治却日趋滑坡。大运河为中国东部内陆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货运量与日俱增,运河流域日趋繁华。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看,则可以发现运河经济所产生的文化意义。交通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思想、政治诸领域内矛盾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这里便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大运河畔的交通要塞、商业重镇,研究《金瓶梅》首先须认真研究大运河,研究运河经济文化。

本文作为《金瓶梅》文化背景研究之“一论”,旨在揭示(京杭)大运河与《金瓶梅》的重要关系,以供“金学”同仁参考。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诞生之源和成长摇篮,那么,始发于春秋,形成于隋朝,畅通于明朝的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根主动脉。

运河最早的两段是邗沟和鸿沟。邗沟,是条连接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春秋时期,吴国战败越、楚之后,为进一步挥师北上,讨伐齐、晋,称霸中原,由吴王夫差于鲁哀公九年(前486)下令开凿。鸿沟,引黄河水入圃田泽终入颍水,是战国魏惠王十年(前361)开凿,目的在于为渠溉田。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则是隋炀帝的事,他先后下令开凿了通济渠(沟通淮河与黄河)、山阳渎(以邗沟为基础)、江南运河(沟通浙江即今之钱塘江与长江)及永济渠(沟通黄河沁水与白河,直达涿郡即今北京市西南),从而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全国运河系统。隋炀帝如此之大举,首先是一统中国的政治与军事的需要:控制江淮,吸聚财宝,便于调兵,征伐高丽。然而,这条由数十万劳动者的生命和血肉铺砌起来的交通要道随着封建王权在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唐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显示出极其重大的经济价值,从而成了唐以后内陆运输的重要干流。

入明,朱氏王朝已是自觉地认识到这条动脉交通水道对自己的经济意义。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运河的意义更为重大,决不只是南北两京之间的纽带。其首先是南粮北运这一重要的经济使命就必须由这条河流承担。由于运河各段水源来源不一,且黄河常因泛滥而改道横行,隋以后的运河常发生中断,到了元代,迫于诸方面的需要,建都大都(今北京)的元统治者立意修通运河,并将呈“之”字形的隋运河布局尽力拉直。但是元代并未彻底解决两大难题,一是中段会通河水源不当,二是黄河泛滥时仍然中断漕运,因此在元代,漕运多从海路。明初沿袭元制,漕运从海。但是,海路运输要担风浪之险,翻漕船、溺军卒的事故时常发生;改从陆路,车马费用数倍于漕船,且山高路险,民工叫苦不迭,于是明朝各代前赴后继,解决了元代运河两大难题,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运河布局,

南北运河方始畅通无阻。永乐之后,漕运大多由海转河,明中叶始,海运基本罢停,加上运河漕船开始使用平底大船,每年约有四百万石漕粮从江南经运河北上,源源进入京城。

明初,针对海外诸国入贡并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一事,朝廷在浙江之宁波、福建之泉州和广东之广州(今地名皆同)设立“市舶司”,分别掌管日本、琉球和占城、暹罗、西洋诸国通商市宜。后来又又在交趾(今越南河内市)、云南(今云南省昆明市)设立“市舶司”,以掌管西南诸国朝贡互市之事。国外来宾及其所携贡品、货物进京者,也多取道大运河。国内除京师(今河北省)、山东(今山东省)、南京(今江苏、安徽两省)、浙江(今浙江省)这几个运河流经地区的官吏百姓、行商坐贾当然借运河舟楫之便北上南下外,长江、黄河、海河、淮河、钱塘江流域的人们也常常是顺江河东下,再走运河上京下府,走南闯北。于是,这条南起杭州(今杭州市)、北达京师(今北京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一千八百公里的人工河道便日益繁华热闹起来。过去的小村小镇,很快成了重镇大城,运河两岸成了全国州府最密集的地区。明朝两都,首都京师(今北京市)镇于运河北端,留都南京(今南京市)卧于运河南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今苏州市)、杭州(今杭州市)以及湖州(今浙江湖州)、镇江(今江苏镇江市)坐于运河南线;扬州(今江苏扬州市)、徐州(今江苏徐州市)、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为运河中段要地;德州(今山东德州市)、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为运河北段重镇;而临清州既夹于卫河、运河交会之要冲,又是南北运河之咽喉,是大运河枢纽之地。

《金瓶梅》一书中多次说到临清码头和大运河。西门庆行商坐贾活动与临清码头和运河息息相关,来旺与韩道国经常借道运河下苏杭吴湖,置礼办货,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接受西门庆的贿赂不止一次两次,西门庆的货物过关时自然被他“青目一二”。西门庆与官场交接也得益于运河,蔡状元(后来的蔡御史)、宋巡按,都是西门庆在“新河口”接住,迎进城去。有学者考证出小说中的清河县即当时的临清城,因书中所写的清河县地理位置与城内外布局多与临清城相符;小说的后二十回,更是直接以临清码头为重要空间描述故事。可以说,屹立在交通要道运河之畔的临清城以其重要的地理条件和商业经济条件成为《金瓶梅》一书的中心空间。正因为如此,对《金瓶梅》一书作者和成书年限的考证不

可丢弃临清和运河这两条重要线索而去旁征博引或牵强附会,对《金瓶梅》一书的思想、艺术和文化研究不能只论及封建社会中封建之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而不论及地域性的商品经济、商业小社会、商人阶层及共周围的市民生活。

二

交通运输是商业的前提,是商业的命脉,这是经济发展的一条自然规律。而商业的发展,则是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运河两岸城镇的发展正是这样,临清城为典型一例。

据有关史料载,“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至元始始创开会通河……至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浒以通漕运。永乐迁都北平,复加疏凿……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集杂,商贾萃止,骈檣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随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王侁《临清州治记》)。可见,临清城正是借运河而发展起来的。

明初,京卫有军储仓,以供军需国用。洪武三年,增置到二十所,并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境内)、临清两地建仓以供转运之用。洪武二十四年,临清储粮达十六万石,以供给训练骑兵。不久,会通河通航,朝廷在徐州、淮安、德州建仓。三仓与临清、天津二仓合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后来又把德州仓移到临清的永清坝。至宣德年间,临清已增造至可容三百万石的大仓,成了运河畔最大的漕粮转运枢纽。于是,这“城濒运河东岸,斜值卫河入运之口”的临清,被“南来漕船”“谓之出口”,而成了“舟楫往来极便”之要道。当然,借运河舟楫者不只是北上漕船,还有南下货舟,官船私货,私船官货,南杂北货,东西土产,各类商船也必由之而东西南北。临清城自身也因漕船商舫行舟集中停泊转运之需,出现了我们今日所说的“第三产业”,酒楼饭馆、旅舍客棧、商铺货店、码头驿站,在桅檣林立的同时纷纷出现。《古今图书集成·方輿汇编·职方典·东昌府部汇考六》中写道:

临清州,州缩汶、卫之交而城,齐赵间一都会也,五方商贾鸣櫂转毂,聚

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微歌，连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椎埋剽掠，不耻作奸。士人文藻翩翩，犹逾他郡。

这段话除去对商贾的偏见，可以看到临清的繁华。明代大学士李东阳的两首《鳌头矶》是这样描绘的：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金瓶梅》一书多处描绘了临清城的商业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繁华热闹，现以《金瓶词话》为底本，列引数例：

杏庵道：“此去离城不远，临清马头上，有座晏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第九十三回）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筮，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篙芦席的。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第九十三回）

原来这座酒楼乃是临清第一座酒楼，名唤谢家酒楼，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山冈，前临官河（即运河——笔者注），极是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第九十三回）

经济上来，大酒楼上周围都是推窗亮隔，绿油阑干。四望云山叠叠，上下天水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楼上下有百十座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正是：得多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从正月半头，这陈经济在临清码头上大酒楼

开张,见一日也发卖三五十两银子。(第九十八回)

这段话最后一句写的是大酒楼经济收入一笔,比起前文藻饰性的描绘来,是更准确地反映了临清的繁华与商贾活动的情况。三、五十两银子,约值白米四、六十石(嘉、隆、万三朝米价不一,灾年丰年不一,一般讲,灾年约合八钱银子一石,一般年份合六钱左右)。可见获利极丰,生意兴旺,往来顾客之多。当然,临清码头决不只这一家酒楼。而酒楼客栈的生意则是该地交通与商业情况的一面镜子。又如:

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第八十一回)

这就难怪“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第九十二回)。

早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山东巡按陈济上言:“淮安(今江苏淮安市)、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东昌(今山东聊城市)、临清(今山东临清市)、德州(今山东德州市)、直沽(今天津市),商贩所聚。今都北平(今北京市),百货倍往时。”这一对京师商品茂盛原因的分析,展示了临清等地商业活动十分活跃。

宣德四年(1429),朝廷开始设置“钞关”,即今日之商业税务局,征收商税。当时有灤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沂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只有上新河和九江二钞关不在运河之畔。一般钞关对来往商船收纳“船料”(按商船的长宽大小而酌情收钞的税款),而临清、北新二钞关还兼收货税,《金瓶梅》一书多次说到临清钞关的这些活动。这当是临清商业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

运河经济文化,包括运河的开挖、疏通,运河用途的变化发展,运河两岸的变化发展。像临清这样的枢纽要塞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交通、经济而引起的其他文化现象(诸如政治、哲学、宗教、文艺、风土民情等,笔者另有专论,此处不详述)是产生《金瓶梅》这部奇书名著的文化背景之一,当然,首先是产生《金瓶

梅》一书中所再现的社会现实的文化背景之一。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文化背景的角度,站在运河畔的临清码头来看《金瓶梅》,《金瓶梅》的作者更多的是描写封建大社会中的商业小社会;揭示的是小农自然经济中的商品经济现象及其一部分实质,塑造的是与奴隶心态的农民有某种程度不同的“自我”心态的商人形象、市民形象。这些人物都不是用某些道德范畴的概念可以概括的。比如硬要给以商兼官的西门庆头上戴“市侩”“恶霸”“淫棍”“流氓”的帽子,便是牵强附会;应伯爵等人虽然常常“帮闲”“贴食”,然而又是这种社会中商贾活动不可缺少的“帮忙”“自食其力”的角色;贬潘金莲和李瓶儿为“淫”“恶”,褒吴月娘和孟玉楼为“贞”“善”或贬为“奸”“滑”皆难以合古情今理。这些人物正是在运河经济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尽管这种选择违背了传统的、世俗的规范而导致了各自不同程度的悲剧结局。值得指出的是,产生并发展在中国东部的运河经济文化是比古老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更新的文化模式。中国的文化模式并非铁板一块,中原一统。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金瓶梅》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

三

东亚地区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特别是东部地区没有一条严格意义上的南北流向的大江长河,更没有一条连接各条东西流向水源的交通水道。狂傲无羁的黄河数千年来不知改道了多少次,最终还是借已有的水道由偏西向偏东流入大海。这在海路危险、陆路艰难的古代,对政治上追求封闭保守的封建王权来说,创造了一个使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地理条件,各级地方官僚也可以在人为划分的州、府、县治境内任“父母”官,当“土皇帝”而操纵生杀大权,封建王朝得以平稳迟缓地延续发展下去。然而,这种地理条件也给经济(当然不只是有利于封建专制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于是,运河,这条南北水道的畅通,便使得这种地理条件的含义发生根本的变化。“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此俗语放在运河之上,更具深刻的含义。

隋、元、明三代都是天下一统之王权。隋、元开挖大运河,目的在于输送兵